

论“文德”：文学“中国梦”的核心精神

李逸津 来继霞

摘要：“德”是古代中国人独创的概念。中国“文德”论兼有“文之德”与“文人之德”两方面意义。在“诗言志”纲领下的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文之德”，是把文学的本质定位在抒发正确崇高的思想情感上，把文学的功能定位在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取向上。由此而来的中国“文人之德”，则要求文人立身修德，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中国古人提出的培养“文德”的途径是“养气”，具体包括“感物”与“读书”两个方面。古代文论的这些思想精华，对于新时代文学“中国梦”的圆梦之旅，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文德；文学；中国梦

作者简介：李逸津，男，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387）

来继霞，女，研究实习员，文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人事处，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3) 03-0106-04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媒体上的一个高频词。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中国梦”做过这样的阐释：“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人在文学上的“中国梦”。而文学“中国梦”的核心精神，我们认为就是中国文论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德”论。这里，就“文德”论的内涵、特征、培养途径及现实意义做初步探讨。

“德”是古代中国人独创的概念，始于西周初年的周公。《尚书·君奭》篇记载周公旦对召公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意思是说，上天是不能迷信的，我们的执政原则只有努力发扬文王的德政，上天才不会解除文王所受的大命。“德”在这里与殷商奴隶主所迷信的“天命”相对立，是人应遵守的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家创始人老子将“道”与“德”并提，成为其理论体系中两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道德经》第51章云：“道生之，德蓄之”，“德”是“道”的具体体现。庄子说：“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这里的“德”是“物德”，即某物之所以成为某物的本质属性。这样，所谓“文德”就兼有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文之德”，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二是“文人之德”，也就是文人作家应具备的道德修养。

一、文之德

文之德，用现代文艺理论的话来说，就是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对这个问题，今天有种种回答，诸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作家思想情感的抒发”、“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的一种审美创造”，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不错的，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都能找到类似的说法。^①但古代中国人所强调的重点，却是在思想感情的表达，即“言志”。《尚书·尧典》记载古代圣王舜对其乐官夔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段话，朱自清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它构成了与西方以古希腊“摹仿说”为源头的诗学观念不同的理论体系。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刘勰的“风雅之兴，志思蓄愤”；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李贽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中国文

① 《乐记》云：“乐者，乐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汉书·艺文志》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论一贯主张借物抒情、于形象之外寄托深厚的意蕴，这成为中国人文学“中国梦”的心理动因与审美追求。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言志”说本意在抒发情感，“志”与“情”在本义上也是相通的^①，但在中国儒家学者的解说中，“志”又往往是与政教相通的情感与胸怀。《论语》中记载孔子和弟子们闲坐各言己志，弟子有的表示要做贤相，有的表示想做能臣，最不济的也表示要按儒者的本职，做一个好的婚丧礼仪主持人。只有曾子的父亲曾点说自己只想在暮春时节，穿上新做好的春装，约上几个朋友，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沂水洗洗澡，登上舞雩台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颌首微笑说：“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这段谈话，非关治国，即关修身，总之都是合乎正道的雅正清高的思想情感。套用今天西方文论的话语来说，就是建立在某种权威化世界观背景上的“宏大叙事”。这在中国古代就叫做“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

这样，“诗言志”纲领下的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文之德”，就把文学的本质定位在抒发正确崇高的思想情感上，把文学的功能定位在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取向上，用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说，也就是要传递“正能量”。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学艺术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2] (49)}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3]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文学的崇高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文学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德”观念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弘扬。

当然，我们讲对中国传统“文德”论的继承与弘扬，并不意味着古代儒家政教中心的文学观就是完全正确。过分强调文学政教功能，将其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确实也有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的多方面需求之嫌。但是，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生存条件相对艰苦、宗教势力相对薄弱、文化教育又仅成为少数人专利的国度，民众中口耳相传的歌谣俚曲、话本戏文，又确实起着传播文明、推行教化、凝聚人心、规范伦理的作用，成为历代统治者施行“文治”的重要内容。从古代儒家提倡的“乐教”，到近代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等主张，对文学作品思想意义的偏重，历来是中国人文学观的特点。在当今文学艺术日益产业化、商品化的时代，文学艺术产品所具有的一般商品属性使其娱乐性、适俗性，市场卖点、票房价值等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但文学艺术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又使它的生产与传播必须纳入一定的规范，必须受社会政治效益、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规范和制约。

事实上，即便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标榜“自由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文学艺术产品的思想内容，也是有控制底线的。不久前美国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宣布，已将涉嫌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影片《穆斯林的无知》的制片人纳库拉逮捕，并交法庭审判。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弗拉基米尔·索洛金也因其长篇小说《蓝脂》被指控“传播色情材料”，而被莫斯科一个激进青年组织告上法庭。这个组织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护文学道德性”活动，在位于市中心的大剧院广场设置了一个巨型马桶，用来销毁以索洛金为代表的当代相类似的作家的作品。这些都说明，文学这种精神产品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使其绝对要受社会法纪、道德规范的制约。近年来我国文艺事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使我们由衷地感到重提中国传统“文德”论的必要。不久前有文章列举了当前文艺上出现的问题：“如‘宏大解构论’，某些历史小说借助虚拟历史空间来表现主观筛选过的历史内涵，在解构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唐孔颖达《正义》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宏大叙事时,对历史事实采取了戏弄和逃避的姿态,最终从历史颠覆走向了历史迷惘;又如‘零度写作论’,一些文学作品力图消解文学的教化 and 审美功能,尝试将文学所依赖的历史背景彻底虚无化和终结化,这在一些先锋诗人的‘表演性写作’、一些新写实小说家对‘直接经验’的追求、一些朦胧诗中对‘大写的人’的极力宣扬等现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历史消费说’,一些文艺作品为了赢得市场,对某些反派历史人物随意翻案,或过多渲染历史阴暗面、过多描绘权力倾轧和声色犬马,或对历史人物进行戏说,并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于各种离奇的因素。”^[5]面对这些把文艺事业引向邪路的危险倾向,中国传统文论重视文学思想内涵,要求文学弘扬正气、端正导向,仍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和拨乱反正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人心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不应是“繁采寡情”、不负责任的游戏之作;更不应是宣泄卑劣情欲,伤风败俗、误人子弟的文字垃圾。它应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留得住作者英名,故古人对之慎而又慎。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称其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气出之”、“矜气作之”(《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就是因为他把文学看作是严肃的事业。

二、文人之德

正因为文学是“志之所之”(《诗大序》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文心雕龙》语)的产物,所以创作主体的心志状态、特别是道德情感修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文德”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文人之德”。

中国古代文论一贯关注创作主体心性品德的修养。《周易·大畜》卦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就是说君子最高的修养是内心被刚健的气势所充实,其德性与日俱新散发光辉。《论语·宪问》篇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建安文人徐干的《中论》说:“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盛德之士,文艺必众。”唐代文豪韩愈《答李翊书》云:“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清代学者沈德潜《说诗碎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刘熙载《艺概》则断言:“诗品出于人品。”道德文章,以德为本,历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特色。

中国文论一贯主张言为心声、文品源于人品,历来期望作家艺术家的文格、艺格与人格和谐统一。从人民群众对德艺双馨的作家、艺术家的热爱,及对文艺圈某些丑闻的愤怒中,可以鲜明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心理定势。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作家思想改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置于创作诸环节的首要地位,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指出:“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也体现了中国文论重视作家主体修养、重视“文人之德”的一贯精神。

俄罗斯现代新汉学的奠基人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曾在其1944年写的一篇论文《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①中比较过中西诗学的差别。他说,古罗马贺拉斯的《诗艺》是直接写给戏剧作家的教导,所以他总像一个“稳重的教师”在示人以法。^{[6](253)}在《诗艺》中有对诗格、韵律等技巧问题的论述,而这些在陆机那里是空白。因为他的《文赋》是“精神和情绪的诗,而不是做诗法。”^{[6](252)}似乎可以这样说,西方人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技艺,而中国人则把文学看作是人的一种修养。对于中国人来说,做诗或写文章最重要的都不是靠机械的法则,而是靠心灵的感悟,靠内在资质的涵养。这是中国诗艺理论与西方最大的不同。

对于如何培养“文德”,提升作家的内在资质,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可操作的法则,值得认真梳理、研究和批判地继承。孟子曾经提出著名的“知言”、“养气”说,即“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所谓“养气”,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功夫。它需要“配义与道”,经过长期的蓄养,才能形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其所谓“浩然之气”,指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后形成的一种理直气壮的精神状态。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言辞的能力,即“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词知其所穷。”虽然孟子本人并没有说明“养气”与“知言”二

① 最初发表于1944年《苏联科学院公报》“文学与语言部”第3卷第4分册,1978年收入《中国文学》论文集。

者的关系，但后人却从中领悟到“知言”的能力植根于“养气”，并进一步从“知言”联想到“立言”。作者道德高尚，方能写出正气凛然的传世之作。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藹如”，就是说的这种境界。

培养“文德”，古人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养气”，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而这“气”如何养成？古人提出的办法有两条，即“感物”和“读书”。先秦儒家典籍《乐记》上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宋代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为儿子写的诗中說：“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所有这些，都是说要深入生活、磨炼思想、积累素材。

中国古人在讲“感物”时，还特别强调所感之物的“雅正”性质。前引《乐记》在说音乐“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之后，还有一句话曰：“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荀子在《乐论》篇中说：“齊縗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有什么样的“物”，产生什么样的“情”；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培养熏陶出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就是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感物”或云“深入生活”指出的一条正确道路。

“养气”的第二个途径是读书。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在讲了“缀虑裁篇，务盈守气”之后，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读书，还要读好书，古人所谓好书，当然只能是儒家经典。《文心雕龙·体性》篇曰：“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唐代韩愈《答李翊书》云：“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当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所作的演说《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7]对于文学家来说，那就要尽可能多地阅读哲学、美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大量研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典籍，学习借鉴前人成功的艺术经验和技巧方法。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学是“人学”，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作品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文学要用思想、学识、情操来感染和教育读者，用艺术魅力来征服读者，它的作者就必须具备高尚的思想情操、深厚的理论修养、渊博的生活知识以及丰硕的艺术积淀。

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国梦”有着丰富的内涵，还可以做进一步挖掘、梳理和探讨，但我们以上所概括的“文德”论，应该说体现了文学“中国梦”最核心的精神。处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代的广大文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立身修德，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德之操”，坚守文德、追求文美、锤炼文艺，出色完成文学“中国梦”的圆梦之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中国梦”(N). 人民日报, 2012-11-30(1).
- [2] 毛泽东. 毛泽东论文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49.
- [3] 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184.
- [4] 胡锦涛. 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0.
- [5]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J]. 求是, 2013(1).
- [6]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Римлянин Гораций и китаец Лу Цзи о поэтическом мастерстве[M].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ука, 1978: 253.
- [7]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48.